

复旦大学历史系
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切问集】

下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历史系

建系八十周年论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切问集】

下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问集(上、下卷)/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309-04710-9

I. 切… II. 复… III. 历史-文集 IV. K-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254 号

切问集(上、下卷)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06

字数 1680 千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710-9/K·163

定价 150.00 元(上、下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DEDICATED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FUDAN UNIVERSITY

谨以此书献给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80周年

目 录

— 中国古代史编

- 史学史三题 朱维铮/3
-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
——“东林党”论质疑 樊树志/24
- “象”：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 顾晓鸣/48
-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
——读《魏书·序纪》 姚大力/64
-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
变迁 韩 昇/78
- 康熙与清宫“科学院” 邹振环/107
- 献俘礼研究 高智群/129
- 试论马鸣《佛本行经》 钱文忠/172
-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
影响 张海英/186
- 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 高 晞/202
- 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 邓志峰/214



- 清末民初儒学传授途径的现代化及其
中止 廖 梅/234
- 浙敦 065 文书伪卷考
——兼论敦煌文献的辨伪问题 余 欣/247

二 中国近现代史编

- 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 金冲及/263
- 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
历史背景的一项考索 姜义华/278
- 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对象刍议
——以南京国民政府 1927 年至 1937 年
期间为例 吴景平/319
-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
一体化走向(1950—1955 年) 张济顺/343
- “官督商办”与“命令书”
——中日政府对近代工商企业经营管理
方式的比较研究 朱荫贵/360
- 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 戴鞍钢/383
- 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
——简析 20 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
及其成因 章 清/397
- 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 金光耀/418
- 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 ... 王立诚/440
- 卢沟桥事变爆发真相辨析 曹振威/461
- 方志目录学刍议 巴兆祥/476
- “‘竖三民’报”与韩侨问题 傅德华/487



-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
执政府 冯筱才/496
- 外交、外债和派系
——从梁颀政争看 1920 年代初期北京
政府的外交运作 陈 雁/523
- 论太平洋战争后日汪对上海保险市场的
监控 赵兰亮/541
-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
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张徐乐/553
- 国民参政会述论 章 红/569
- 圣约翰大学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金 燕/587
-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留俄学生与中国
革命
——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为中心的
历史考察 汪乾明/602

三 世界史编

- 独立战争：西班牙 19 世纪的第一次
革命 金重远/631
-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张广智/643
- 沃勒斯坦与“世界体系理论” 顾云深/659
-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黄 洋/668
- 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 赵立行/680
-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
的形成 冯 玮/702

• 《万国公法》与近代东亚知识人的文明观 ——兼评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人与文明》.....	张 翔/724
• 论古代西亚和北非文明中的几种回忆 模式	金寿福/751
• 历史·比喻·想象 ——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	陈 新/763
• 上海韩人社会性质的变迁	孙科志/780
• 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周 兵/792
后 记	803





DEDICATED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FUDAN UNIVERSITY

谨以此书献给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80周年

—

中国古代史编



朱维铮(1936—),男,江苏无锡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孔子思想体系》(合著),校注《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册),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精选》丛书,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等。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史学史三题*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李大钊、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②,被

* 本文原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① 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② 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师也是第一人。



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①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②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④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

① 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② 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练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③ 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④ 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文革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师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①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

一、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②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祇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③。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④,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

① 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② 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③ 《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④ 《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竟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①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②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蚡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

① 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消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② 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分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讖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陈述西汉和新朝兴亡史的著作,分明是《史记》关于西汉前期五朝史的续作,却斥责司马迁诽谤刘邦及其子孙。但由《汉书》的《艺文志》,抄袭刘歆的《七略》,仍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楚汉春秋》一起列为儒家经典《春秋》的附庸,便可知时至公元一世纪初,学者仍然经史不分,把述史看作解经,就是说论史等于论政。当然从此以后,写历史必须将有利还是不利政治现状,放在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地位。因此,从东汉到清朝,不是《史记》,而是《汉书》,便被列朝统治者认作正史的楷模。

不消说,班固仍列迁史为《春秋》的附庸,也起了反作用。首先他本人续作《汉书》,便被指控“私改国史”,从此近现代正史的编纂,便直接由宫廷监控。其次导致列朝当局越发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例如东汉末权相王允总结的“历史教训”,直到明清二朝为胜朝修史,还被君主奉作圭臬。

全部中世纪史表明,第一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遏阻权力导致的体制腐败取向,第二没有任何一名圣君贤相能够真正钳制民意,第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擅长运用软刀子杀头策略的专制者,也没有一人真正实现李斯向秦始皇所献的“安宁之术”,达到“天下无异议”。

于是,在东汉帝国通过“东观修史”,厉行控制“国史”编纂以后,接踵出现的却是三国史记载的兴旺。西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民族大迁徙和南北诸王朝的长期分立,在史学领域引发的效应,便是官方史学互斗,私人史著繁荣。单是记载西晋一统到东晋南迁的史著,到唐初还剩十八家之多。正因为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控制,附庸已蔚为大国,因此两晋王朝清理宫廷藏书,不得不面对现状,将《史记》《汉书》以来的各类历史著作,从经部分出,归为一部,并迫于数量巨大,将它从丙部晋升为乙部。

北宋的理学先驱程颐,曾想直接干预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唐太宗的“评价”,要求给予“篡名”,并且要求从忠臣不事二主的角度否定魏征。他的干预没有成功,或许这是朱熹最终将司马光排斥出北宋道学宗师系统之外的一个理由。

然而司马光不肯屈从程颐关于唐太宗、魏征的“评价”,终究表明自从史部独立以后,没有任何正统学者,可以强迫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六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作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闹独立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讧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邪教而进行镇压。所谓官逼



民反,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珅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政变,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划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真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